

長安

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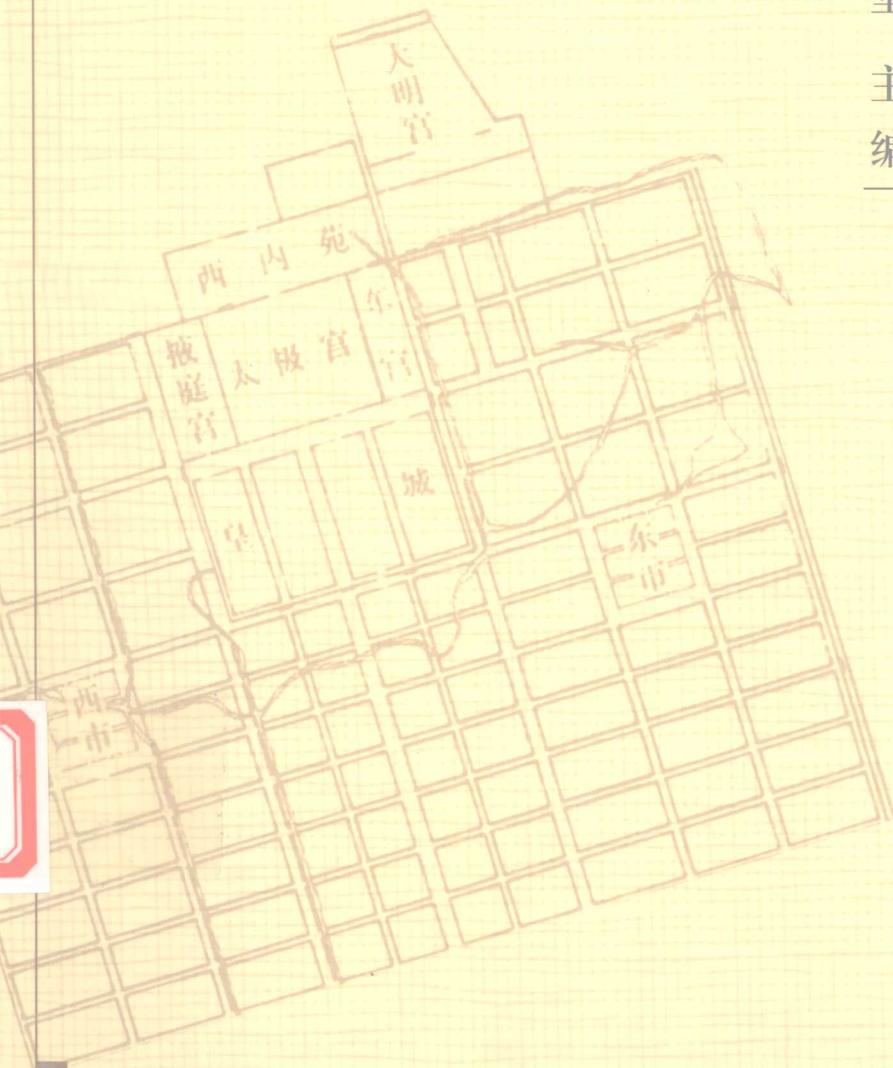
市

宮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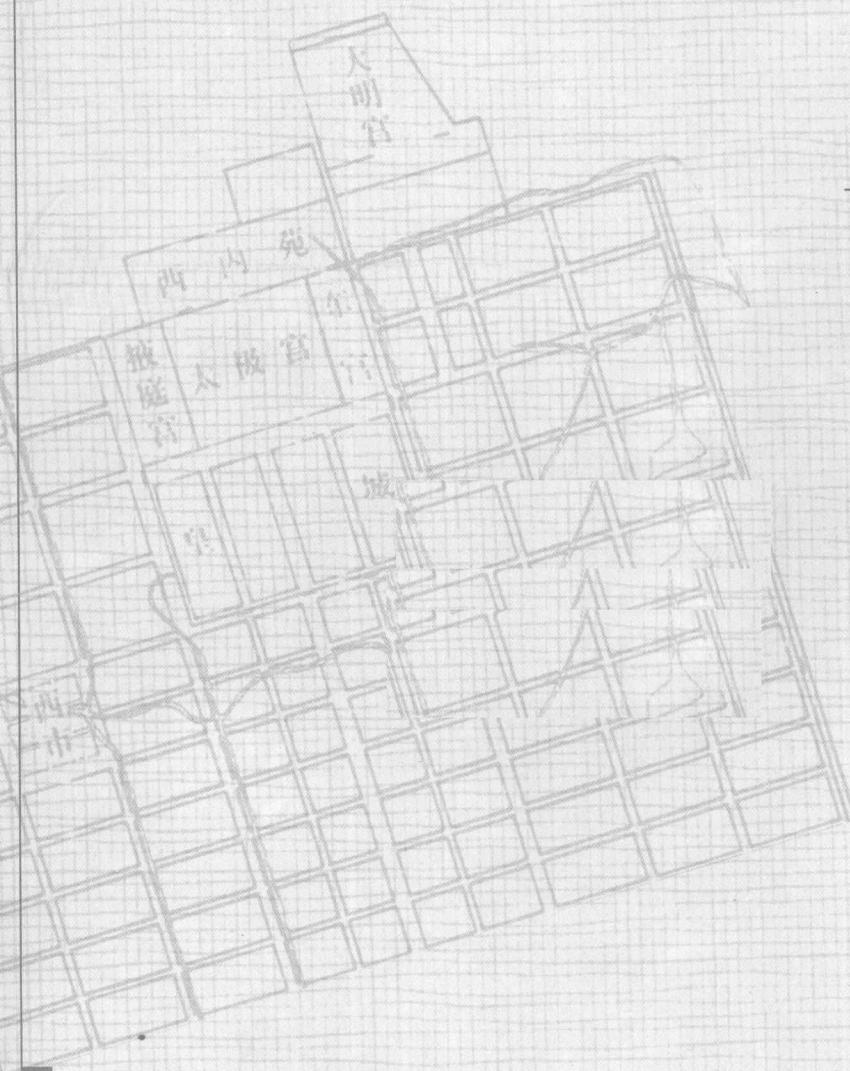
長安文學

Changan Shixue ■ 侯甬堅 主編



(第三輯)

(第三辑)



长安史学

Changan Shixue ■ 侯甬坚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安史学. 第3辑/侯甬坚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4

ISBN 978 - 7 - 5004 - 6187 - 6

I. 长… II. 侯… III. 长安(历史地名) - 地方史 - 研究
IV.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7908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印 张 24.5 插 页 2

字 数 450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对于高等教育的领导与指导问题集中于“文革”初期，王任重、李锐、谷牧、耿飚、胡启立等一时间游目骋怀，浮想联翩。《人民日报》社论《文艺要繁荣兴旺，单靠创作家还不够，还要有健全的领导》，张德庆《文运与日月同升》，叶剑英《科学和艺术要出人才，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朱光潜《文艺批评要讲党性》，胡乔木《文艺工作要讲党性》，等等，都对“文革”的文艺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但“文革”期间，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被扭曲，变成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同时还要为资产阶级服务”。胡乔木在《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同时还要为资产阶级服务》中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同时还要为资产阶级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胡乔木的这一观点，对“文革”时期的文艺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中平原，千里锦绣，古号土膏，陆海、沃野，其地黄壤，“田惟上上”。这里产生过十三个封建王朝，演出过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也是民族、阶级、派系相斫的血腥决斗场，文化底蕴既深厚又复杂。解放后，虽然出过敢于逆流而上、真言直谏的省委书记胡耀邦和“一叶知秋”的农民理论家杨伟名^①，但也不免紧跟全国，进行过反来复去的大折腾。“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让领导揪心的教育、科技大省却成不了经济强省的困局，说不定更符合自然之道和科学的发展观。君不见，不顾一切的乱发展已毁掉了环境和资源，破坏了社会的祥和与安宁，甚至危及了一些人的生存和生命，而由此欠下的巨债都将由纳税人加倍偿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夹缝中，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崛起了。史念海教授首举“为世所用”的旗帜，率先创办了历史地理研究所和唐史研究所，接着，黄永年教授创办了古籍整理研究所，朱本源、柳植教授创办了苏联史研究室，周伟洲教授创办了民族研究中心，赵吉惠教授创办了中国思想史研究所，并编辑发行了《历史地理论丛》、《唐史论丛》、《古代文献研究集林》、《苏联历史问题》、《西北民族论丛》等刊物。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各地优秀学子纷纷汇聚西安，执陕西师范大学教席，于是又有周秦汉唐研究中心、古文明研究中心、数字化史学资料中心、唐史研究所、欧美研究所、东北亚研究所、青铜器研究所的诞生。学校也制定了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如学术著作出版补贴、人文社科研究资助项目等，最近，又特别专设了文科科研楼，精心装修了窗明几净的教授工作室。在远离政治和商业中心的西部，知识分子终于可以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没有理由不努力，学术成果泉涌而出也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① 1965年，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胡耀邦针对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大、宽、活的治陕三字诀，可谓逆流而上。1962年，户县农民杨伟名等人，写《当前形势感怀》，又称“一叶知秋”，认为解放后应用二三十年时间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并对合作化、私人工商业改造中的错误提出批评。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院、所、中心诸同仁决定将老师们的成果编为《长安史学》，陆续出版。这对丰富学术的百花园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好事。而且，若能长期坚持，还可以形成良好学风，正确引导青年。何炳棣教授认为，蒋廷黻当年主办清华大学历史系的经验有三条，即：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经验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仍有弥足珍贵的指导作用。试想，没有世界和现代眼光，如何能洞察中国问题的真相；没有经济、哲学、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各方面知识的充分融会，如何能窥见事物的深层结构；没有运用多重证据法进行的严密考证，如何能在历史研究中也做到实事求是；而如果不把考证所得的结果加以综合分析，又如何能找出事物的内在关联、社会的演变轨迹和趋向，挖掘其演变的终极原因，给人类提供智慧和启迪。因此，我热切地期望，通过《长安史学》的发行和传播，将会有助于旧清华的成功做法在新条件下获得更高层次的复兴。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理应尽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实在太多了，好不容易才盼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我们只有坚持科学，反对迷信，坚持民主，反对专制，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才能无愧于伟大的时代，才能促进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不断调整，以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能引领人民向前，使国家和民族永离苦海。《长安史学》既然是正直知识分子的思想阵地，就应拒绝阿世媚俗的低濫之作，并对悄然兴起、却大有蔓延之势的文化复古主义保持警惕。

历史学科教授们的工作室多在新区，掷笔推砚，临窗而眺，“幽幽南山”，近在咫尺，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值此朝彻见独之际，我衷心地祝愿《长安史学》“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永远充满活力；更祝愿学术背景、研究领域、观点方法、志趣爱好、禀性脾气都各不相同的同仁们，能够“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紧密团结在《长安史学》周围，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繁荣作贡献。

赵世超

目 录

中国古都与中华文化关系研究	朱士光 (1)
十六国夏国新建城邑考	周伟洲 (12)
论秦都咸阳的城郊范围	李令福 (19)
隋大兴城的兴建及其对原隰地形的利用	李令福 (30)
五代、宋元时期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	薛平拴 (40)
明清西安城市水利的初步研究	史红帅 (56)
明清时期西安城空间格局的发展变迁及其影响	史红帅 (81)
清代西安城会馆的初步研究	史红帅 (107)
关中早期城市群及其与环境关系探讨	肖爱玲 朱士光 (123)
试论徐州建都之地理基础	肖爱玲 (131)
从习惯线到法定线：我国政区界线性质的变迁	侯甬坚 (143)
唐代我国西部政区的演变	许正文 (150)
汉州唐道的设置与分裂割据王朝的形成	许正文 (160)
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与变异	周伟洲 (168)
公元3—6世纪的南海诸国及其与中国南方诸政权 之关系	周伟洲 (177)
唐代河曲粟特人“六胡州”治城的探索	艾冲 (200)
论唐代后期沙陀突厥东迁的四个问题	艾冲 (211)
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 与分布	艾冲 (219)
隋唐时期陕西境内的人口迁移及其影响	薛平拴 (237)
盛唐时期陕西人口研究	薛平拴 (254)
明清时期陕西境内的人口迁移	薛平拴 (279)

2 长安史学（第三辑）

论历史时期大陆向台湾的移民与往来 许正文 (309)

西部交通的历史考察 张波 王双怀 (316)

古代外官本地回避制与东西部

技术转移 张力仁 张明国 (333)

我国古代东西部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 张力仁 张明国 (346)

我国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的历史变迁 介永强 (360)

中古西北佛教译经文化区考论 介永强 (369)

中国古都与中华文化关系研究

朱士光

在当今兴起的研究、传播中华文化的热潮中，海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古都，特别是古都文化之活动，又异军突起，成绩斐然。这不仅于近些年来促使形成了一门新兴的中国古都学，而且还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化研究活动的蓬勃开展。

一 中国古都与古都文化研究概况

论及对中国古都之研究，固不自今日始。司马迁著《史记》就曾记述了“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建国各数百千岁”^① 的史实，还从它们所处地理位置阐释了“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② 这一原因。同时，对前代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国家及嬴秦之故都咸阳有关情况也作了记述。^③ 自那以来，除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郡国志、地形志与地方志、笔记、游记等史籍著述中包含有大量关于前代都城的资料外，还出现了一批专事研究、著录古代都城的著作。内中著名的就有西晋陆机撰《洛阳记》、北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六朝（另一说为中唐以后）人撰写的《三辅黄图》、唐韦述撰《两京新记》、宋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与张礼撰写的《游城南记》、元骆天骥撰《类编长安志》与李好文撰《长安志图》、明刘侗撰《帝京景物略》与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与周城撰写的《宋东京考》等。真可谓硕果累累，代不绝书。

迨至近现代，自 20 世纪初起，许多中外学者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手段，跳出单纯记述的窠臼，对广布于中国大地上的古代都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有的是通过实地考察与考古发掘，探寻到一批历史上已湮没了的古都

① 《史记》卷 129 《货殖列传》。

② 同上。

③ 《史记》卷 5 《秦本纪》、卷 6 《秦始皇本纪》。

遗址，如河南偃师市二里头夏代初年都城斟𬩽^①与尸乡沟商汤都城西毫遗址^②，以及近年来为一批专家学者认同的商汤所建另一座更重要的都城——郑州商城遗址，四川成都市三星堆与金沙古蜀国都邑遗址^③等；更多的则是参采史籍文献与实物遗迹等多种资料，通过考证与考察以及综合分析等方法，对有关古都的问题开展了三个层面的研究。第一层面微观复原性研究。这是基础性研究，就是考订复原古都之墙垣城门、殿堂楼阁、寺庙陵寝、街巷里坊、市廛馆驿等具体的建筑设施，也包括考订古都中曾发生的重大事件与人事活动。这方面研究成果甚多，真可谓不胜枚举，故不赘列。第二层面宏观综合性研究。这既包括对有些古都所作的综合系统研究，也包括对中国古都所作的整体全面研究，内中有些还进行了理论概括与总结。这方面的论著也不少。最具代表性的有侯仁之著《历史上的北京城》^④以及由他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⑤、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⑥以及与朱士光合作主编的《古都西安的变迁与发展》^⑦、王仲殊撰《中国古代都城概说》^⑧、叶晓军著《中国都城发展史》^⑨等。第三层面则是在前述两个层面研究基础上，深入探析古都文化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前述两个层面的论著中，有些学者实已有所注意，并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论析时也有所涉及。近年来随着古都学研究的深入与中华文化研究的持续开展，对于古都文化的研究日益成为古都学领域一个主导方向，正蓬勃深入开展。这方面近年来问世的成果可举作例证的有：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国古都的变迁与文化融通》以及笔者所撰《论汉唐长安文化之内涵与特征》、《初论我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演变及其与儒学之关系》^⑩等论著。

近 20 年来，中国古都学会作为国内直接从事古都学术研讨活动的社会民间团体，在组织国内外学者开展上述三个层面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发挥了促

^① 《史记》卷 2 《夏本纪》。

^② 赵芝荃、徐殿奎：《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都研究》第 3 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③ 屈小强等：《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2 页。

^④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2 年版。

^⑤ 北京出版社 1988 年版。

^⑥ 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6 年版。

^⑦ 即将由西安出版社出版。

^⑧ 载《考古》1982 年第 5 期。

^⑨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⑩ 先后刊登于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的《中国古都研究》第 12 辑与三秦出版社 2000 年版的《中国古都研究》第 14 辑。

进作用。这个学会自 1983 年在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的西安市建立以来，已先后在西安、南京、洛阳、杭州、开封、安阳、江陵、北京、银川、大同、偃师、曲阜、新郑、莒县、徐州、赤峰、成都、鹤壁、太原等古都所在城市举行了 21 次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论文集 17 辑，另有 3 辑也即将出版。在近年来的学术活动中由于关注古都所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对这批城市在开展现代化建设中做好保持古都风貌与开展有特色的古都文化旅游方面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因而受到有关地方政府的欢迎与支持，学术研讨活动也得以日形活跃，这一现象又反过来促进学会更加注重古都文化的研讨活动。笔者作为学会现任会长，曾多次进行具体的研究并在学术研讨会上阐释开展这方面研究的意义与作用，倡导深入推进这一层面研究。如 1998 年 10 月曾在新郑市举行的中国古都学会第 15 届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论新郑古都文化研究与古都文化资源之开发》一文；2000 年 3 月 29 日至 31 日在受邀参加山西省临汾市举行的祭尧暨海峡两岸尧文化研讨会上，曾作了以《关于尧文化与尧都研究的几点初步意见》为题的发言；^① 2001 年 7 月，在参加内蒙古赤峰市举行的中国古都学会 2001 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时，提交了《有关辽王朝历史、文化、都城问题之管见》一文；^② 同年 10 月在应邀参加中国秦汉史学会在陕西咸阳市举行的秦文化研讨会上，作了《关于秦都咸阳及秦文化研究的几点见解》的大会发言；2000 年 11 月，在为江苏徐州市举行的中国古都学会 2000 年学术年会暨中华古都徐州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研讨会所提交的题为《中国古都学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思路》一文中，更明确提出将古都文化研究作为新世纪里中国古都学应着重开展研究的三个方向之一。^③ 正是因为重视古都文化研究已成为古都学界的共识，所以近几年来由中国古都学会主办或参办的古都学术会议，均将相关文化的研讨列入会议议题，甚至在会议名称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当然除中国古都学会外，还有一些与古都研究有关的学术团体，如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等以及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加强了古都文化的研究。

二 古都研究与中华文化研究的关系

1997 年初笔者在为安阳古都学会与安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

① 后据发言要点整理成文，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2000 年第 2 期。

② 该文已收入《中国古都研究》第 18 辑上册，国际华文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该文收入《中国古都研究》第 17 辑，三秦出版社 2001 年版。

《中外学者论安阳》一书（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提交的题为《中国古都研究与古都之现代化建设》一文中，在论及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都学的发展应注重中国古都文化的研究时，曾写了下述一段文字：

历史上历代列国往往都是以自己的都城作为中心区域创造出代表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最高水平的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在当时是支撑各该王朝与政权得以存在的内在精神支柱，还是构成国都、乃至全国繁华兴盛气象的重要因素；同时古都文化还对古都所在地区当今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广义的古都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在有关古都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并不单指文学艺术，所以看似抽象，实际很具体，而且抓住古都文化研究可以统领有关古都研究的总体内容，推动有关古都的深层次研究。

上引论述十分概括，对之还可作下列引申。

——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一个王朝或一个时代文化的缩影。如安阳是殷商文化，西安是周、秦、汉、唐等王朝文化，开封是北宋王朝文化，杭州是南宋王朝文化，北京是辽、金、元、明、清等王朝文化荟萃之地，因而这些古都地区的文化当然是建都之王朝，甚至是一个时代文化之缩影。

——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以至当今特定区域文化的中心。按时下学界划定的我国几个主要文化区域论，如齐鲁区域，其文化中心自然是齐国故都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与鲁国故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市）；荆楚区域，其文化中心也当为楚国建都历年最长的郢都（在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区）；岭南区域，其文化中心也应首推曾在历史上作过南越（赵佗）与南汉国都之广州；巴蜀区域，其文化中心则当属曾作过古巴国与蜀国都城的重庆、成都；等等，不一而足。

——古都文化内涵丰富，规格甚高，举凡历史上物质文化方面的墙垣、宫殿、宅邸、园林、道路、渠刻等建筑与陶瓷、木石、金属器皿以及服饰、食物、舟车等用品，精神文化方面的典章制度、思想观念、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风习俗等，古代都城中均应有尽有。有的还是都城中所独有，如皇家宫殿园林等；有的虽然其他城市也有，但唯都城所具规格最高。

——古都文化空间辐射力、时间穿透力强劲。正因为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一个王朝文化的代表以及它所统治区域之文化中心，内涵十分丰富，且规格很高，所以它们的文化，当时就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或借重朝廷官府力量，或凭据自身之品位魅力广泛传播，有的甚至远传域外。在王朝或政权被更替之后，经历时代沧桑的洗涤，这些古都所积淀的历史文化，有的也会发生程

度不等的嬗变，但也有不少精粹融入新王朝或新时代文化中，并继续发挥其影响作用。

综上而论，古都文化可以说浓缩了中华文化之精髓，深入至中华文化之核心，也渗透进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除前述它是历史文化的代表、区域文化的核心之外，还在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社会职业文化与社会阶层文化以及行为文化（即衣、食、住、行文化，如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民居文化、行旅文化等等）方面均有突出体现。由此可见，古都文化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华文化离不开古都文化；通过研究古都文化，可以集中而又深入地认识与把握历史上一个王朝或政权的文化以及由它们统治过的一个区域的文化之内容及其特质，同时还可通过研究古都文化推进对中华文化多个层次多个侧面的深入研究。中国古都文化研究与中华文化之研究二者之间密不可分，且相互促进。

中国古都研究能在中华文化中发挥出如此重大的作用，除与前述古都文化具有的品性有关之外，还与中国古都数量多、分布广有着一定的关系。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通常说法是拥有5000年文明史，近来有学者认为我国文明史应自新石器时代初期起始，应有8000年，甚至10000年的悠长历史。当然文明史之起始时间与古代都城最早出现年代不同步。一般而论，中国古都学界将经考古学界通过发掘研究论定的夏禹之子启建立的夏王朝初年所都之斟𬩽（遗址在今河南偃师市二里头），作为中华大地上最早之都城。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研究结果，夏朝始建于公元前2070年。^①自那以来的4000余年间，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经过众多民族的艰苦缔造先后建立了多个王朝与政权，在它们彼此不断分合更迭的历史大潮中，也出现了一大批古都。由于学者们判定古都的见解与标准不尽一致，导致统计出的古都数量相差颇大，但都数以百计。即以较晚期发表的研究结果论，叶骁军在其《中国都城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之附表中列有219处；丘菊贤与杨东晨合著的《中华都城要览》（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更列叙了400余处。中国古都学会前会长史念海在他撰写的《中国古都概说》^②一文内，则具体论证有187处。依笔者之见，第二个统计数字过多过泛；后一个数字考订较严，但却偏少。史念海先生1998年编订《中国古都和文化》论文集交中华

^①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6页。

^② 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书局出版时，收录了该文，并作较大修改。主要修改处是增补了一批古都，经他考订确认的古都数达到 217 处，与叶骁军教授所定古都数字接近。但两者所考订古都之具体名单有一定的差异。笔者认为史先生考订的较为严密，但仍有需作增补与修改处。如陕西省应将咸阳（秦孝公所建都城）单独列出；河南省还应增加偃师市（夏都斟𬩽与商都西毫所在地）、三门峡市（虢国都城所在地），赵都中牟所在地应将原定之汤阴县改为鹤壁市；山西省也应增加平陆县（虞国都城所在地）；山东省应增加莒县（莒国都城所在）；安徽省应增加凤阳县（明中都所在）；内蒙古自治区应增加宁城县（辽中京所在地）与正蓝旗（元上都所在地）；河北省应增加张北县（元中都所在地）。因此我国古都所在城市与遗址至少应在 220 处以上。此 220 多处古都在我国分布甚广，可说除海南省与上海市、天津市外，其余的省、市、自治区均有分布。这一分布上的广泛性，也使对我国古都研究在推进中华文化研究上之覆盖面可及于全国。

此外，从这批古都目前状况及在我国现实中的地位看，尽管其中一些已长期湮埋于地下，如今发掘出来，只是考古遗址，或者沦为废墟，且远离当今之城镇；但大多数经过后世发展，重又焕发生机，或成为各级政区行政中心，或更具经济与文化功能。特别是一批古都所在的城市，由于在历史上曾作过都城，当前又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而被各级政府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内中被定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即有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安阳、南京、杭州、江陵、广州、大同、成都、曲阜、苏州、扬州、大理、拉萨、银川、敦煌、邯郸、淄博、咸阳、重庆、福州、隋州、钟祥等 30 多座城市。从上列名单中即可看出这些古都所在之城市，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与在当今研究中华文化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尤有甚者，这批列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古都以及另一些古都所在城市，大都有千年以上甚至 3000 多年的建城史，有数百年甚至逾千年的建都史。如西安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莽、汉更始帝刘玄、赤眉、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黄巢大齐等 16 个王朝与政权建都，历时长达 1133 年。洛阳作为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朝代以及李密、王世充等政权之都城，历时也逾千年。其他都城，据史念海先生研究，北京建都历时为 903 年，南京为 450 年，开封为 366 年，安阳为 351 年，成都为 249 年，银川为 226 年，江陵为 224 年，杭州为 210 年，巴林左旗辽上京为 202 年。有百年以上建都史的城市为淄博、成县、新郑、邯郸、濮阳、广州、曲阜、敦煌、福

州、徐州、重庆、朝阳^①等。建都王朝与政权多，历时长，其文化积淀必定丰厚。然而也有一些古都，尽管历时不长，但因为历史的原因，却在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具有特别的作用。如大同，作为北魏政权前期都城历时 96 年，虽然不足百年，学术界咸认定是研究北魏前期历史与文化的中心。陕西靖边县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接壤处的统万城，虽然作为公元 5 世纪初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都城仅 15 年，但却是研究这个历史时期虽昙花一现却又威震一时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这一政权之历史、文化必到之处。

综上所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中国古都文化的研究是研究中华文化的必经之途，也是推进中华文化研究深入开展的基点。

三 今后古都文化研究的取向

前文述及，中国古都数量既多，分布又广，且历史内涵深厚丰富，因而与中华文化研究关系密切，作用重大；从古都学界近来研究动态与趋向看，在日益深广地对中国古都之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开展研究的推进下，也已进入到重视古都文化研究的新阶段。当然，由于起步时间不长，学术界的力量整合协调不够，所以古都文化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今后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开展。那么究竟应如何着手方可有效地加以推动？笔者认为，除学者本人作出努力外，有关的学术团体应该有意识有组织地加以引导与协调，政府相关部门也当积极给予支持。至于研究取向，笔者认为可从学术研究方面与应用研究方面考虑，现谨就这两个方面发表一些初步想法，供学界同仁考虑。

1. 学术研究方面

有关古都的各种学术问题，因为均沾溉了历史的风雨，有的甚至蒙受了消逝岁月的尘埃，披拂着神秘的面纱，所以在进行考证、辨析、复原、重构工作的基础上，均可深入到文化的层面进行阐幽发微，揭示其深藏于物象内核的历史文化意蕴，因此在这一方面可以全面推进。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 对古都所在城市或地区不论建都时期或非建都时期历史文化源流、内涵与特征均加以研究。固然建都时期之文化状况应作为古都文化研究重点，这是由古都文化所具有的性质、特点决定的，前已作详细陈述，道理很

^①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137—142 页。

明白，自不待言。但建都前后时期当地的文化状况与建都时期的文化状况也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废不为都后迄至当今的文化状况，有时还可作为探索、研究建都时期文化状况的重要线索与回溯起点，因而不能弃之不顾。那样做，势必限制了研究的思路与范围，不利于古都文化研究。

(2) 对涉及古都文化的问题，不论大小都同样重视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大到古都整体文化，如古都制度文化等，小到对古都中一些具体而微的遗迹遗物所蕴涵的文化内容均可进行研究。前者究竟因牵涉的内容广泛多样，虽有学者进行尝试，但成果尚不多，今后还需着重努力。后者则量大面广，甚而有些平常看起来不起眼的物件，也有研究的价值。如日本学者岩本公夫对北京、西安之门礅的研究^①就是一例。

(3) 对古都所在城市或地区不论地上、地下之遗存、文物都要开展研究。一般而言，学者们对地面之遗存、文物进行研究的较多。因为它们有目共睹，容易获得资料，虽然成果也较多，但今后工作量仍不小。比较而言，地面上的遗存、文物更为丰富。西安、北京等大古都如此，一些建都朝代不多，历年不长的古都也如此。如河南新郑市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与韩国都城所在，历时 175 年。但在那里，继 1993 年在建筑施工中发现大量的青铜器窖藏之后，近来据媒体报道，又在郑韩故城内发现多位郑国国君大型墓葬与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车马坑以及 3000 多座墓葬，其规模超过了秦始皇兵马俑。当然，对地下遗存文物的研究，首先有待考古学家们的发掘与研究，但是相关学科专家也当密切关注，积极配合，从多个专业角度展开研究，以便及时增添古都文化研究的新内容。

(4) 对古都史籍文献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工作，是整个古都文化研究工作的基础性建设，还当进一步加强。过去中华书局曾组织专家对一批有关中国古都的典籍进行了点校注释工作，以“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为名，先后出版了几种。如元代骆天骥撰、黄永年点校的《类编长安志》(1990 年出版)，清代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的《唐两京城坊考》(1985 年出版)，清代周城撰、单远慕点校的《宋东京考》(1988 年出版)等。只是以后没有继续下去。实际上尚有一些古籍需作这类研究。此外对散存于史籍文献中有关古代都城资料，也可分类辑录、出版，以丰富古都文化研究内容。这项工作可以单座古都为对象进行。这样做一方面较易着手，另方面使用起来也较为方便。

(5) 加强对古都文化整体系统的研究。这包括两类研究：一是对单座

^① [日] 岩本公夫：《北京门礅》，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 页。

古都之文化源流、特征作整体系统研究。在内容上，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在时间上，则做到贯通古都所在城市形成、发展、变迁整个历史过程。二是对整个中国古都文化进行综合研究。这项研究工作量较为浩大，也可先从单项入手，再整合集成。现在有些研究机构与出版社准备组织力量撰写、出版多卷本的《中国古都通史》或《中国古都丛书》，中国古都学会也有意推进这项工作。这些都将对中国古都与古都文化整体系统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6) 重视中国古都学与古都文化理论建设。中国学者对古都的研究虽然历史已很长久，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中国古都学，其形成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迄今尚不到20年。虽然成果丰硕，但毕竟起步晚，学科理论建设尚不很完备、成熟。目前在有关中国古都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上，还只是对中国古都的定义与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中国古都学研究的任务与目的以及主要的研究内容开展了较具体的研讨，取得了一些基本认识。至于对更深层次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讨，开展得还不够。其中许多问题与古都文化有关。所以着力加强中国古都学基础理论建设，也将有力促进古都文化研究。

2. 应用研究方面

古都文化研究除具学术品性与价值外，还有着多种应用功能。主要有下述三端。

(1) 城市保护、规划、建设与管理。当前中华大地上，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开展，大、中、小城市建设速度也日益加快，一批古都所在城市更是走在前列。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城市中有不少文物古建遗存及传统建筑街区被作为阻碍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障碍或影响城市现代化形象之陈迹遭到拆毁破坏，造成令人痛心疾首的损失。后经学者专家与有识之士的批评，这一现象有所制止。但另一方面，在如何进行建设与管理方面又遇到新的严峻问题，也即当前古都学家与城市规划建设专家们所说的“城市特色危机”。许多富有丰厚历史文化遗产与民族、地域特色的城市，通过现代化建设，都成为高楼大厦林立、火柴盒式的居民楼遍地竖起的模式，这种千城一面的外观，毫无个性特色可言，既泯灭了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又对城市营建自己的文化氛围与城市形象极为不利，连带着又对城市对外宣传及发展经济不利。前一种现象可称为“建设性破坏”，后一种现象可称为“破坏性建设”。当然这都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也都是对古都之历史文化缺乏认识，甚至有意忽视造成的，是对历史文化无知，甚或是愚蠢的一种举动。由此可见对古都文化加强研究，确实对这些古都所在城市之保护、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具

有现实指导意义，是这些城市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急需开展的一件要务。有鉴于此，西安市政府已于 2003 年初，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开展了“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通过专家学者研讨，确立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是一项政府行为，政府要起主导作用；是一项长期性工作；要全方位进行保护；要实行法治化管理；要科学研究先行，依靠科技创新；专家要参与决策等原则。并具体将西安市历史文化资源价值评估及开发利用研究、传统历史街区及古城风貌考证研究、世界五大古都与西安古都保护发展比较分析研究、传统特色文化继承与发展研究等与古都文化有关的内容作为子课题列入这一战略研究之中，并期待依托这一将持续不断进行下去的研究，推动古都西安城市建设工作顺应历史发展固有轨迹进行。即既能继承传统文化，保持古都风貌，又能实现现代化，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北京市于 2003 年底宣布，由专家学者、人民群众、领导干部通力合作完成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也已出台。该规划明确提出从整体上保护北京旧城，对历史水系、传统中轴线、明清皇城、旧城“凸”字形城郭、道路及街巷胡同、建筑高度、城市景观线、建筑色彩、古树名木等 10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已经确定的第一批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基础上，又新增 1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同时还规定旧城内兴建的住宅必须用坡屋顶部形式，还将传统地名列入保护范围，严禁随意修改传统胡同、街道的历史名称。^① 上述规划的出台，与中国古都学会顾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等一批专家学者长期对古都北京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内涵等进行的卓越研究分不开。以上事例说明，结合城市现代化建设对古都文化开展深入研究，对城市文物古建及古都风貌的保护有着重大意义。因此今后凡古都所在城市均可循此路径深入开展研究。

（2）古都文化旅游。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兴起，中国各地之古都也日益成为中外人士旅游的热点。事实上，中国古都旅游资源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还具有旅游功能的多样性与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等特性。^② 如果将古都旅游与名山胜水旅游结合起来，则将大为增加旅游的文化内涵与吸引力。2002 年 8 月 5 日《光明日报》记者高平据内蒙古旅游集团总裁高建国之呼吁著文指出，我国北方草原尽管景色秀丽，但文化内容单调，除了广袤的草地及零星散布的牧民毡房外，由于对历史文化旅游要素的开掘和利用不

^① 赵德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出台》，《光明日报》2002 年 9 月 19 日，A4 版。

^② 朱士光：《试论我国古都旅游资源之特性》，《中国古都研究》第 4 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